



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

РЕДК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КАРТИНЫ И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БРАНИЙ

苏联藏 中国民间年画 珍品集

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

苏联阿美乐尔出版社

1989·北京

苏联藏 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

出版：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苏联阿芙乐尔出版社
(列宁格勒)

印制：中国北京人民美术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1990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102-00864-3/J·803

定价：150元

**РЕДК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КАРТИНЫ И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БРАНИЙ**



编选与序文：王树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李福清（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刘玉山（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

图版说明：王树村 李福清

中文翻译：佟景韩（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刘玉山 许桂芹（中国） 古萨罗夫（苏联）

设计：云 鹤（中国）

目 录

中国的木版年画艺术·····	王树村 (1)
中国年画及其俄国收藏者·····	鲍·李福清 (10)
中国民间年画的艺术美简析·····	刘玉山 (26)
主要作品原收藏者索引·····	(32)
图版及图版说明·····	(1—206)
图版目录·····	(1—3)

中国的木版年画艺术

王树村

过去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和城镇，每逢农历腊月近年的时候就有叫卖“年画”的吆唤声，有的小贩还编成“卖画小调”，边唱边卖。如《水浒》故事的画，则唱：“梁山泊，忠义堂，一百单八将美名扬；宋江就在堂上坐，打富济贫，除暴安良。”藉以吸引买主。有的画商支搭席棚，将印制的各种题材形式的新年画粘贴在墙上，任游人观赏选购。这种新春里一年一度的赏画听曲的热闹情景，在中国的旧社会来说，不啻是一民间美术展览会，也是劳动人民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这点，在其它国家的民间文艺活动中，还未有所闻。因此中国的民间木版刻印的年画，便成了东方独具民族特色的一宗劳动人民的艺术，故尔曾引起外国文化人士们的注目和收集。

在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也和其它国家一样，无不被剥削阶级攫为己有，其中当然也包括文化艺术。但是置身于人民大众生活中的民间艺人，因为他们是人类文化艺术的开拓者，又是民族文化艺术的承传人。所以尽管剥削阶级对他们的劳动成果劫取掠夺，然而民间艺人创造出来的艺术珍品，却日新月异地不断涌现于人间。这样不仅活跃了人民生活，美化了劳动大众周围环境，同时也给人类文化艺术宝库积累了一大笔财富。其中具有千百年历史的中国木版年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由于木版年画是随着中国民间风俗而来的一种艺术，人们每逢新的一年就要换一张新样。又因年画对象（欣赏者）多是劳苦大众，题材内容势必要符合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样就使得中国民间年画既不同于皇家画院的“待诏”之作，也不同于文人士大夫为抒发个人胸中逸气而作的墨竹兰草之类；而是描写人民喜闻乐见的岁时风俗里的文化活动；反映劳动生产的渔、樵、耕、读；表达人民希望生活改善的五谷满仓，丰衣足食，以及歌颂保卫祖国领土完整，人民生活安定而抗击侵略者的民族英雄等题材。此外，还有一部分教育人们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和祭祀各行各业祖师（如建筑工人尊春秋时鲁班为祖师，上古杜康为造酒业之祖师）；祈求降福祛灾的天官神仙（如钟馗、门神、“天仙送子”）等。毫无疑问，民间年画对研究中国民俗风情，人民思想意识以及美学心理等等，是最有价值和丰富的形象资料了，所以不少国外的博物馆、民俗馆、美术馆、图书馆等等，都注意收集它，或作为藏品或展出，供研究中国问题专家们参考。其中尤以苏联十月革命前汉学家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收集独多，见藏于苏联列宁格勒各博物馆中。本图录所选，多半为其清末来华收集者，堪称珍品佳制。为使读者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重视中国劳动人民创作的年画艺术，及其过去收集的概况，由苏联汉学家李福清通讯院士著文撰述；关于图中的艺术鉴赏和分析，则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版画家刘玉山总编辑撰

文介绍。笔者仅就中国木版年画艺术发展之史实，略加概说，就教于诸位专家读者。

一、宋以前年画发展之一瞥

刻版印画，虽然创始于8世纪初的唐代，但是早在公历纪元前，中国就已有了岩石上凿刻字画的艺术，不过那时造纸工艺尚未发明，还不可能拓印石刻上之字画。公元2世纪初，汉朝和帝（刘肇）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以树皮、麻头、破鱼网等试制纸张成功，俗称“蔡侯纸”，从而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有了一大飞跃。当时“蔡侯纸”属于试制，质量不可能柔韧坚实，其产量也不会高。所以汉唐以前的中国绘画，大都是绘刻在石室、石棺或绘制于台阁粉壁以及绢帛上。随着造纸工艺的不断提高，纸的质量向精密坚韧高度发展，雕版刷印术的发明，才可能出现了像甘肃敦煌莫高窟近年出土的《雕版捺印佛像》残本。此图见藏于敦煌文物研究所。图中佛像三尊一组，刻“西方三圣”（中为阿弥陀佛，左右分刻大势至和观音菩萨）。据段文杰所长告知，此一残本与清朝末年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从敦煌石窟中窃走的那些雕版捺印佛像，同属于唐代开元、天宝（公元713—756）年间之物。其后，僧侣为宏扬佛法，广传教义，雕版印刷经卷日渐增多。卷首扉页多附印佛图画面，而且构图繁密，版面增广，这就使世界美术领域里又开放出了一朵版画艺术之新花。至今研究世界版画艺术发展者，无不例举中国唐代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印造的《金刚经》卷首之《祇树给孤独园佛说法图》为典型。

宗教版画艺术的向前发展，推动了中国固有的民间木刻版画艺术的繁荣。北宋时都城开封，每到“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这一文献记载，不仅可以证实了民间木版年画艺术业已形成，同时造纸手工业和雕版技艺的提高，为刻印《考古图》、《宣和博古图》以及拓印汉魏石刻字画，提供了物质基础。至今四川绵竹、山东潍县印制的年画品类里，仍存有印本和拓本两种，即其遗意。此外，沈括《续笔谈》中，曾记有宋神宗（赵顼）于熙宁年间，将宫中收藏的唐代吴道子画《钟馗》像拿了出来，令工雕版印刷，在除夕夜晚分送给东、西府臣属。这一记载，反映了画家名作翻刻成年画形式，同是始于北宋年间。

公元12世纪初，北方的金太宗（完颜晟）之兵攻下开封，宋高宗迁都临安（杭州），史称南宋，从此东京开封雕版印画的艺匠和画师，一部分随往行在杭州；一部分被迫迁到金代雕版中心的平阳（山西临汾）。这一时期杭州印制的年画仍多是驱邪迎福的。如吴自牧《梦粱录》中记述新年杭州景物时说：市上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门、回头马等馈与主顾。又《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载：“街市宽阔处，有卖等身门神，金漆桃符板、钟馗、财门。”以上引用的宋人笔记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纸马铺印钟馗、财门等题材的年画。反映了北宋时，以刻版用纸刷印神佛像，供应顾客焚化于神前的纸马店，到了南宋增添了印制钟馗等年画品类，证明社会经济繁荣，新年需要年画装饰者增多，市场扩大了；一是市上出现了卖等身（与人身相等）的高大门神，这类巨幅精彩的门神出现，可知



平升三级

中国版画发展到南宋时期，其艺术水平已达到何等高度了。

南宋时期北方的金朝，平阳刻版业兴起，此一时期的年画，见有四幅存世：一幅是《东方朔盗桃》，纸本，彩色套印。画汉代神话人物东方朔，盗得瑶池王母之仙桃一只，回首作惊逃状，象征长生不老，原作现藏于西安陕西博物馆中。另三幅，一是《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纸本，墨线刷印。画汉代赵飞燕、班姬（婕妤）、王昭君和晋代石崇之美姬绿珠四位古代绝色佳人，故此图又名《四美图》。人物造型雍容华丽，衣装锦绣高贵，背景补以雕栏玉阶，湖石花木，宛如后妃游于上苑景色。图中人物绘刻之线纹，恰如高古游丝之描法，柔丽圆润，堪称精妙绝品，无与伦比。一是《义勇武安王位》。同为纸本墨线版印。此图类似宗教题材画，画汉末关羽头扎软巾，身穿战袍，盘一膝，握一拳坐于胡床上，旁有金甲武将捧印，绶冠武士擎“关”字大旗，四力士持刀护卫于前后。关羽竖眉美髯，威严肃穆，令人起敬。当是西夏（公元1038—1127年）末，甘肃西北一带敬奉的关公神像，惟绘刻精细，不类民间祭毕焚化之“纸马”。以上两幅原图，画面分刻“平阳姬家雕印”、“平水徐家印”楷书小字，得悉原版刻于山西临汾。今天，山西临汾仍是晋南年画印制中心，古版遗存虽然近百片，然而无复堪与上述两图媲美者。第三幅是一纸本白描淡彩。画一头戴“东坡巾”，身穿朝服，面蓄长髯，形貌仿佛员外郎者，坐于一靠背交椅上，旁有短袍长裤之侍童立于其左。人物面前放有金宝财物于地上，背后有草木衬景，画面无题识，从构图与人物形象来推测，仿佛与《三教搜神大全》中之“福神”相似，冬宫博物馆汉学家鲁多娃同志撰文称此图当是中国之财神，亦未尝不可。据日文大正五年（公元1916年）《艺文》三月号，狩野直喜的《南宋之版画》一文中，得知现收藏于苏联列宁格勒冬宫博物馆的《四美图》等木刻年画，乃是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帝俄时代柯兹洛夫在我国西北边陲一带进行考古工作时，从甘肃黑城子（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西夏城遗址里发掘者，藏于彼得堡。十月革命，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这批文物得到保存下来，今已公开展出，广大人民群众方得共赏之。

二、元、明时期的年画概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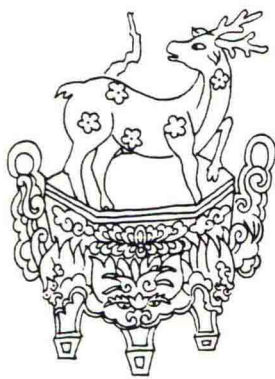
元世祖忽必烈（公元1215—1294年）定都燕京（后称大都，即今北京），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灭宋，统一了南北一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但因统治者重视畜牧生产，敬仰佛道，迷信较深，最初贵族别迭等曾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主意，想把肥沃农田，尽荒为草场，供其放羊牧牛，故尔谈不上发展工农业之生产。另外，在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行记中，提到大都北京：“彼处营业之妓女，娟好者达两万人。每日商旅及外侨往来者，难以数计，故均应接不暇。至所有珍宝物品之数，更非世界上任何城市可比”。元统治者一方面漠视工农业生产，一方面在都城集珍宝与商旅、妓女，过着奢华淫逸的生活，怎能在文化方面有所建树！所以元代自建国到衰亡，不足百年。谈到民间年画，除了元人诗集中，有杨允孚《咏九九消寒图》一诗，反映了北方年画中又添了一种历画新形式外，没有什么可稽的文献资料了。实物资料也仅有《骆驼进宝图》、《八方朝贡》、

墨线印的“纸马”而已。

朱元璋领兵起义，夺得了元朝统治权，改国号曰“明”。朱元璋贫农出身，称帝后，兴修水利，推行屯田制，并减轻工匠劳役，这就为明代后期的商业和手工艺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明代的插图版画艺术随着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兴盛而出现了一个黄金时代。同时民间年画艺术因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产值提高，需求者逐渐增多，从而得到了新的迅速发展。在明代遗留下的实物资料中，有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刻印的《九九消寒之图》，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皇明一统图》，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一团和气图》，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南极星辉图》、《寿星图》，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八仙庆寿图》以及甲冑门神、堆粉沥金门童、钟馗和《十王图》纸马等。这些资料皆孤本一张，不可再得，可知当时流行的年画题材。在有关年画艺术的文献资料中，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进士茅维曾写过《闹门神》一杂剧剧本。剧情针对当时腐朽的明朝官僚机构，予以丑诋热嘲。内容大意：农历除夕晚上，人们按传统习惯依旧是请新门神上门，老门神退位。可是老门神却占着位子不走，新门神无法上任，于是新、老门神争闹起来。这时灶王、钟馗、和合二仙、紫姑等神仙见状不妙，都下来向旧门神劝说：你老了，应该退下来让新门神上去，不然新的接班者无法安排。但固执的老门神自以为功高，却装聋作哑，赖在那里死也不肯下来！全剧最后，由于老态龙钟的门神不听劝告，玉帝大怒，遣九天监察使者把老门神及它的仆从“顺风耳”等狗腿子，一并发配到边远的沙门岛。此戏虽然是讥讽那时官场恶习，但至今仍有借鉴作用。此外就戏中出现的灶王、紫姑、和合二仙等神仙人物，加上遗留下来的《寿星图》和《万事如意》、《百吉图》等门童来说，可知明代民间年画题材多是吉祥瑞庆为内容者。画法和形式上也多是工笔重彩，尚未脱离宋元道释人物画之风格。

三、盛极一时的清初年画艺术

清代继明朝之封建统治，农民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国内战争并未结束。到了公元1661年南明覆亡，康熙（玄烨）帝即位后国内战争始渐平息。数十年战火连绵，造成社会经济衰落，人畜大量伤亡。清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锐意恢复生产，安定民生；提倡敬天地、重人伦、睦邻里、安居乐业，勿为非做歹。其时，人民久乱思安，开始重建家园，生产明显上升。这点从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等地作坊刻印的年画中得到了证实。例如清初苏州王君甫画店印制的《孝义一门旌》和《三美闲娱图》，《姑苏万年桥》（陈钦震稿）；天津杨柳青齐健隆画店印绘的《教子成名》、《庄稼忙》、《五谷丰登》等作品，可作参考。清朝中叶，社会尚称安定，经济发展也继续上升，出现了一个清代史上所谓的“乾嘉盛世”（公元1736—1820年）。从乾隆年间李斗撰写的《扬州画舫录》中可以体会到当时物产富庶，文物、民间美术、园林建筑等之美，尤其是戏曲艺术和小说唱本之盛行，扩大了木版年画艺术的题材。这一时期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作坊里，刻印了大量以舞台戏曲演出或历史小说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如《赐环》、《寒江关》、《破金光阵》等。有的还将唱本小调细刻在画面



禄位高升

上。如：天津杨柳青年画作坊刻印的《时兴十二月斗花鼓》，就刻印着：“贾宝玉会美人，六月里斗花鼓。荷花水上开，宝琴、宝钗，怡红院盼想那潇湘妃子，林黛玉恨袭人泪满香腮。”等十二段唱词。这类体裁的年画，可使观者一边看，一边顺口唱了起来，却也别开生面。后来的《代唱宫门挂玉带》、《西湖十景逛花船》、《庄家大夫》等，天津杨柳青画店刻印的一些大幅年画，都刻有长篇文章或唱词，就是承传着这一余绪而来（参见本卷彩页图版），其时有李光庭者，著《乡言解颐》一书，在“新年十事”一章里说：“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此文不仅为人民群众喜爱的美术品起了个名字——年画，而且还对以前年画的内容及其价值作了评定。其实民间年画在它的深层结构中，还蕴藏着南齐谢赫所说的：“图画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之意义。这样推重民间年画在中国历史上之作用，并非抬高其身价，因中国美术史上道释人物画发展到了清代，益形衰落，而年画艺术恰好相反，它不止是《孝顺图》、《庄稼忙》之类的教育儿童孝敬父母，热爱劳动，“稚子之戏”的玩意儿。从晚清民间年画艺术中出现的大量讥讽清政府腐败怯懦；反抗帝国主义国家枪炮瓜分中国；歌颂抗敌战斗英雄，劝勉国人发愤御侮图强以及反映西方科学发明，增广新知的作品来看，无一不具有“明劝戒”，“披图可鉴”之功。难怪今天国内外学者，仍在重资不断收集这类珍贵资料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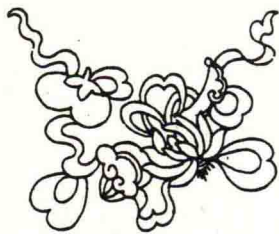
四、晚清爱国题材的新画样

自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清廷失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后，英、法两国又于咸丰六年到十年（公元1856—1860年）联合发动了侵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接着中法战争（公元1883—1885年）、中日甲午战争（公元1894—1895年），到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帝都北京为止，清朝政府在列强各国的压迫下，签订的割地、赔款、开辟租界的苛刻条约，没完没了，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和民族灭亡之危机。同时为推翻腐败的清封建统治王朝，抵御外侮的反帝斗争，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接连起义，加上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爱国进步人士们鼓吹变法维新，提倡西学和修筑铁路，开采矿产，重练海陆军，裁汰冗员……主张，使中国近代史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局面，而这一时期的民间年画，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这一社会现实，因而形成了晚清时期的年画艺术之特色，同时也是中国近代美术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篇章。当时这类反映社会重大题材的年画艺术，多出自天津杨柳青年画作坊，其中又以齐健隆、戴美利、荣昌、戴廉增等字号印版最多。这是因天津距离京都不远，杨柳青画店在北京又有分店者，所以消息灵通，反应较快。如“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乘船逃往国外，戴廉增画店则立即刻印了《捉拿康有为》一图，在讽刺清朝政府昏聩无能的作品中，《庄稼老作知县官话不通》最为典型。图中借一不识字的庄稼人，因花钱买了一个县官去见上级知府，当知府问其政事，庄稼老却一无所知，闹成了所问非所答的笑话。而画面上的官衙仪仗朱漆牌上，分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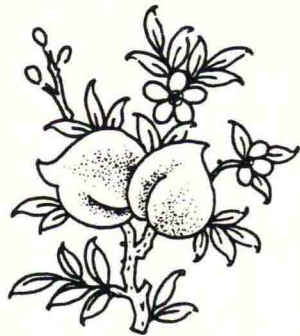
“羊肉县(馅)”、“酱豆腐(腐)”、“大米粥(州)”等字样,更加讥讽了清朝的执政者都是一群鱼肉乡民的家伙。《万寿无疆》一图,虽然表现了民间舞蹈和杂技演出的精彩节目,但它却令人联想到专制愚昧的慈禧太后,不惜将建设中国海军的白银挪去修建颐和园(万寿山)供她享乐,并在她的生日岁的生日时,举办皇会……。给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遗臭万年之恶名。反映农民起义抗拒清政府的,有苏州桃花坞作坊刻印的《扫荡擒匪》(上下本)、《火烧向营,刺铁公鸡》等。在描写反抗帝国主义者侵略的,有《凉山大捷》、《刘提督(永福)克复水战得胜全图》等。《炮打日本国》是一幅歌颂左宝贵、丁汝昌、宋庆、马金叙等将领反抗日本帝国侵略我国的“甲午战争”之英雄。画面还刻有开战年月日,和诗文一首:“五国洋人能,点齐百里兵,拱(攻)打这一阵,德盛(得胜)天不萤(容)。”词句朴素易懂,反映了人民仇恨帝国侵略者的野蛮屠杀。与此同时,杨柳青年画里出现的《国民捐》,是以语体(白话)文宣传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清廷签订了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的《辛丑和约》的故事。因当时人民无力支付这巨额赔款,于是变为三十九年还清,但需赔款九亿八千余万银两。因此民间办起“国民捐”,要有钱的出钱,早日还清,免付利息。此外,还有《女子爱国》、《自强传学堂图》等教人们奋发图强,习文练武以御外侮的年画,很受各界欢迎。如《自强传学堂图》画一新式学堂,男女学生在作体操,图上刻有长篇释文,说:“男学堂,女学堂,均为自强,北京风气大开,国民一统改良……女学堂易致富强,人格不同已往;涂脂抹粉,进庙烧香……”。文中还提出了对子女教育问题,对今天农村犹有现实意义。

自从上海、天津开埠后,西方的民主制度,自然科学和新的交通工具等,不断在“租界”里出现,这些新鲜事物对闭关自守的清朝社会人民来说,很感兴趣,尤其是那穷乡僻壤的边远农村人民,更是如饥似渴地想得此新知。所以苏州桃花坞和天津杨柳青两地年画作坊,同时刻印了不少介绍西方铁道、汽车、轮船、电灯、铁桥、马路以及新矿挖煤,新式楼房建筑等等题材内容的新画样。如《唐山真迹图》,描写了英国人在河北唐山一带用机器开矿的情景。《上海火车站》是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上海吴淞新建的铁路通车实况。杨柳青隆昌画店刻印的《天津马路图》,介绍了在租界新铺修的马路上,维新思想的女子已不避男人们观看,自由自在地骑着自行车乐游玩耍,戴廉增画店印制的《天津河北新浮桥》,不只向大家介绍了钢铁架桥之新科技,同时桥上的电灯,过往的四轮洋马车,两轮自行车、人拉东洋车(人力车),都是过去人们不可见到的国外新发明之交通工具。这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一大奇观。在反映租界里西方人们生活的,有《洋人结婚图》(苏州王荣兴画店印)、《天主堂外国人做亲》(宁和顺店印)、《洋人打围图》(天津杨柳青荣昌画店印),后者画三个持带长枪的洋人正准备外出打猎,一个赭色面孔的亚洲人架鹰牵狗,在为他们服役。体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势力东渐扩张时,中国出现的半殖民地的景观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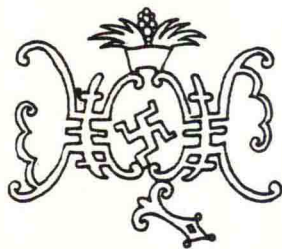
回顾晚清年画艺术之发展,它已冲破了以往的祈福纳吉,历史故事等传统题材之范围,尝以当时重大政治变革,军事战争作素材。但是内容既有反对帝国主义军队侵略破坏,又有提倡效法西方民主自由;既有厌恶和讽刺清政府腐败怯懦,又有反对农民起义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者;还有对于抗拒帝国主义者侵略的英雄,不管他是属于清朝统治阶级或是农民起义领袖,咸加歌颂之。这类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新题材,正是即将覆亡的清朝封建社会末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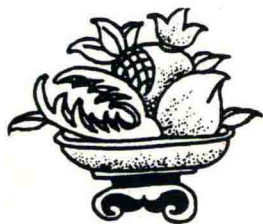
百事如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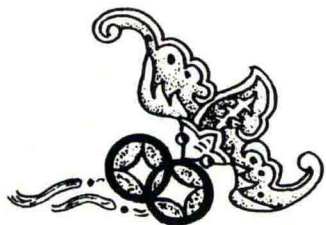
双寿同齐



万寿长青



福寿三多



福在眼前



喜上眉梢

反照。可惜这类题材的年画和原版，因抗日战争时期画店主人惧怕日军搜查，为避免遭到横祸，把大量有反帝战争，或中国军队形象的版与画，全部劈毁。所以本图册中的一些具有中国近代史参考价值作品，堪称珍本佳制了。

五、民国以后年画始渐衰落

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封建王朝，民间年画艺术却依旧沿着描写现实生活中新事物的道路，继续向前发展。当时各地年画作坊刻印了一大批反映革命战争胜利的画样。如安徽芜湖画店刻印的《中国军女大元帅攻打北京》（画徐武英、曹道新女将打败姜桂题），上海旧校场画店印的《中华民国月份牌》画孙文、黎元洪、曹道新、徐武英、黄兴等以及女国民军操练等图像，画面中心还刻绘末帝溥仪如幼儿。反映了革命并未彻底胜利。不久，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张勋欲重新恢复清朝统治，兴兵复辟，接着在帝国主义者支持下，军阀混战不已。民国以来的这类重大事件，民间年画中都反映出来。如《白朗（狼）过秦川》是画河南宝丰白朗起义反对袁世凯自立为帝的故事；河北武强画店印的《南北军大战天安门》描写了张勋复辟失败，被讨逆军赶下台，逃往荷兰使馆的事件。《大战天津图》刻画了直（吴佩孚）奉（张作霖）战争，冯玉祥将军倒戈，反对军阀战争的故事。当时列强各国不仅支持中国军阀战争，同时他们为争夺中国土地也相互残杀，如山东平度年画中的《德日争夺青岛图》，河北武强画店印的《日德大战于青岛》等图，这类题材的年画，都是具有美术欣赏价值，又对文化低下的广大劳动人民起着历史教育作用。后来抗日战争起，全国城乡多被日军炮火轰击，化为焦土，千年来不断发展着的民间年画艺术，至此已衰落下去。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胶版印制的新年画大量出现，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和中苏友好等新题材内容的作品，当时颇受劳动大众之欢迎。因篇幅有限，这里不再一一细说。

六、民间年画绘制之技艺

中国的年画艺术，是以绘、刻、印三道工序来完成的，绘是最重要的第一道手艺。年画最早的形式是门神，汉墓中大都是画在粉壁上（或刻在画像石、画像砖上）。宋朝开始有了印卖钟馗、门神的记载，但也有民间艺人创作一幅稿样，再摹拓数百本而后市上出售者。如北宋“刘宗道，京师人，作《照盆孩儿》，手指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每作一扇，必数百本，然后出货，即日流布，实恐他人传摹在先也”（邓椿《画继》）。随着社会发展，人民需要年画者越来越多，刻版印刷是最好的办法，但为了使印刷品不失其绘画原作之美，天津杨柳青绘制的年画除三道工序外，最后还用手工绘描一番。故尔杨柳青年画艺冠群英，仿佛画家原作。

年画的绘制，先由画师出稿画样（创作出新题材的墨线底稿），作坊主人认可后，画师

用薄绵纸重描一遍，这是第一道工序。第二道工序是刻工将画稿反贴在刨平的楸木或梨木版上，然后依画稿刻出线版及应套印之色版（三至五块）陆续刻完；第三道工序是刷工将全套画版按先印墨线，继印黄、绿、蓝、红等色版，一一刷印出成品，即可交工出售。在杨柳青年画作坊里刷印完的年画叫“坯子”，还要将它交与画工铺粉描金，开脸点唇（头部用笔细描眉眼），而后完成。

木版年画的印制方法在各地作坊也不尽同，像四川绵竹作坊印绘的年画，是以墨线版印出轮廓后，不用颜色版套印，而是以手工开脸着色来完成。四川绵竹刻印年画历史悠久，至今还遗有木版拓印年画形式之一种，这种拓印的年画之版较大，刻版和刷印技法与墨线版相反，它是用阴刻法雕版，变一般画版刻出的凸线为凹线。印制方法也不同，一般年画是刷墨于版面，而后覆纸刷印；拓印年画的原版上不刷墨色，而是将白纸打入画版凹处，然后用“拓包”（一种用布裹丝绵的工具）蘸墨或朱红颜料捶打素纸，画版凹处之线纹即呈白色显象出来。这类拓本年画的内容，都是象征吉祥瑞庆之题材。如《南极星辉》、《福寿无极》等，经过加工装裱，尝被当作祝寿贺喜之礼品，古朴高雅，颇具民族传统艺术之特色。这类年画之来由，推本溯源，始于宋代。由于我国造纸手工业的发展，宋代已有拓印汉代石刻龙凤的文献记载（见米芾《画史》），而汉代歌颂李翁太守的《五瑞图》阴刻石画，是为吉祥瑞庆题材的拓本年画之嚆矢。刷印年画艺术之技术，河南开封年画作坊尚传一技艺，即墨线版以木雕刻，套色版以纸裱厚涂油，干后镂空画面需要套印之色，一版一色，覆在墨线画坯上，用蘸色刷子刷纸版，镂空处之颜色即匀布在画面上，俗称“漏版”，今已失传。

七、年画的题材及其祥瑞象征

民间年画的题材十分广泛，为其它画种所不及，本图册所选辑的作品之内容，可见其概貌。倘若就此来分类，大致可分：一、通俗小说故事，如《苏护进姐己》、《丁山征西》等；二、历史人物传说。如《孔子周游列国》、《写经换鹅》等；三、劝诫教化世人。如《金钱世界图》、《二十四孝行图》等；四、民俗风情活动。如《时兴十二月斗花鼓》、《关外蒙古抢羊斗胜》等；五、时事新闻新趣。如《倭酋唾手得台湾》、《天津河北新浮桥》、《洋人打围》、《庄稼老作知县官话不通》等；六、祈福禳灾求寿。如：《洪恩赐福解限全章》、《钟馗镇宅》、《仙芝祝寿》等图。其它还有《西湖十景逛花船》、《调演双簧》和《博古花卉》、《四季花鸟》等条屏形式者。民间还有藉动、植物或器物的音义，组成象征未来生活美好的题材也不少。略举其主要者为例，以殿本文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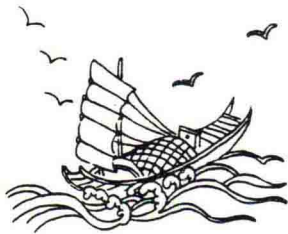
年画中的题材，除了人物故事，风俗民情、时事新闻等外，因它出现在新的一年之首，故取吉利为题材者亦不少，这种题材或通过象征比喻，或借取谐音等，构成一幅内涵吉祥美好的作品。但它又不是吉祥图案，而是附在人物或神或仙的器物上体现出来。常见的有：“平升三级”。以瓶中插三只戟（古代武器），借瓶与“平”字，戟与“级”字同音隐喻虽然无功也可升上三级官爵禄位。“禄位高升”。画一梅花鹿立在一只三足鼎上，因鹿与“禄”之音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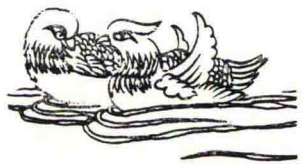
翎顶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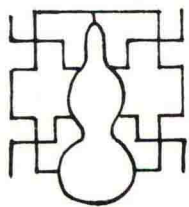
聚宝盆



一帆风顺



福禄鸳鸯



葫芦万代



麟吐玉书

鼎象征封建社会三公（最高辅臣）之位。意味官升到一品的高官。“百事如意”。画一百合（一种可食的植物珍品）、一柿子（果品）、一如意（原为搔痒后背之器物），借其音与物合成的一句吉祥成语。如若画两个柿子和如意，去掉百合，则巧成“事事如意”，若去掉一百合，换一“卍”（读音与万字同）字，则是“万事如意”，也就是什么事都合自己的思想意识。“双寿同齐”。（汉武故事有东方朔盗西王母仙桃；桃三千岁一熟。所以后世皆以桃为代表长寿。）画两个一般大的桃子相联，意味着老年夫妇长寿同享。“万寿长青”。是以“卍”（万）字和“寿”字，加上一盆植物“万年青”组成，盖取寿高而永葆青春。“福寿三多”。《庄子·天地篇》：尧观乎华（地名），华封人曰：请祝圣人，使圣人寿，使圣人富，使圣人多男子。民间年画中除有此故事题材作品外，尝以佛手柑（芸香植物）的佛字与“福”音谐，桃子比作长寿的代表之食品。安石榴内子多，以此三多作为祝颂人生美好之词。“福在眼前”。取蝙蝠口衔两枚古代铜钱，借蝠（福）衔的钱正在眼的前方，故意味着福就到来的预兆；如将一个桃子加到蝙蝠和双钱之间，则成“福寿双全”（钱之谐音）。“喜上眉梢”。画一喜鹊踏在梅花的梢头，比作喜事到了眉梢上来了。“翎顶辉煌”。清代官级品位以帽子上的孔雀翎和顶上的珠宝为高低。瓶中插有孔雀翎及珊瑚玉翠，皆表示官运昌盛，世代不衰。“聚宝盆”传说明代沈万三有一聚宝盆，盆内放进一锭金，明天盆内金锭则满，珠宝亦如此。“聚宝盆”便成了劳动大众盼望得到的宝贝。“一帆风顺”。画一帆船，顺风而下。寓意出外作生意，或进京读书考试，路途上平安无事，考试中取，生意获利。“福禄鸳鸯”。鸳鸯常是雄雌同游，永不分离地浮于绿水之上。福禄（浮绿）鸳鸯象征夫妻美好，幸福又有官作之意。其它还有“冠带传流”（画一船上放有官帽、官衣）、“功名富贵”（画一公鸡在牡丹花下）；牡丹又是富贵之象征。“葫芦万代”。画一藤架上结满葫芦或葫芦上有些“卍”字，意味子孙兴旺。

“麟吐玉书”。取义《圣迹图》：孔子生，有麒麟降，口吐玉书。比喻新婚或生子之家，后代必出圣贤。此图除麒麟吐天书一部外，四周的图样都是象征吉祥的器物。由左至右：一、犀角，代表奇宝；二、棋盘和琴、书、画，统称“四艺”，表示有文化而高雅不俗气；三、笔锭，一枝笔放在一锭金上，谐音为“必定”；四、如意，第三、第四连接一起，则成“必定如意”，万事遂意，达到目的；五、古琴，与第二同；六、珊瑚，热带深海之动物，因晋代石崇有珊瑚数株，高四尺，珊瑚遂成为豪富之象征；七、八，与第二含意同。民间年画中常见的象征吉利之物还有：龙凤，表示夫妻和美。狮子，代表最高官位“太师”。鲤鱼，意味着跳过龙门，未来高贵，或作为丰富有余。再如“暗八仙”（指汉钟离权、唐吕洞宾、张果、韩湘、蓝采和、宋曹国舅，以及何仙姑、李铁拐八仙所持的法器（扇子、宝剑、渔鼓、花篮、横笛、拍板、荷花、葫芦），取八仙祝寿之吉意。“八宝”，以车轮、海螺、繖、华盖、花朵、宝罐、双鱼、盘长（花结）八种名物，转音为：“绶罗伞盖，花冠羽裳”的成仙之意。各地年画中出现的这种象征比喻之吉祥表号，还有很多，以上所说只是举要而已。为了以使国外研究中国古代民族民间绘画者参考。谨附于后，作本文之尾声，尚希读者指教。

中国年画及其俄国收藏者

鲍·李福清

1898年的一天，在彼得堡的俄国地理学会楼内，举行了一次不寻常的展览会。从满洲回来的青年植物学家弗·列·科马罗夫向全体学术会议报告了他1896年及1897年两次去中国东北研究植物群系的成果，并展出了他带回的中国民间版画藏品供大家观摩。

在这批藏品中，有印刷的佛像，有戏曲故事年画，有描写中国人同不久前侵占中国台湾岛的日本人作战和天津城市风光的年画，也有各种历史和文学题材的年画。这些色彩鲜艳的民间版画，作为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反映，吸引了科马罗夫的关注。他收集了近三百幅作品（那时这些画价格都很便宜）。这也可能是世界上的第一次中国年画展览会。

这些画在中文中称作“年画”不是偶然的。这是每逢新年才印制和出售的图画，春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主要和最热闹的节日。

迎接春节家家都要装饰房屋，取下旧年画，贴上新年画。年画的绘制、刻版、印刷当然是全年进行的工作，但出售年画通常只在临近年关时才开始，有时在五月初五（端午节）和八月十五（中秋节）也出售一些。

有趣的是，科马罗夫去满洲时并不是出售年画的季节。他在1896年6月从临近边界的尼科利斯基村出发，到达了中国的吉林市，9月中旬返回俄国。他第二次去中国是在1897年5月，到了沈阳和吉林，11月返国，但他还是买到不少年画。

科马罗夫是一个具有先进观点的人，属于思想革命的青年一代（他曾受到沙皇密探的暗中监视）。他对当时俄国人知之甚少的邻邦中国普通人生活感兴趣可能就出于这个原因。他喜欢勤劳的中国人民。关于吉林的中国工人，他在日记中曾经写道：“他们很有头脑。”科马罗夫参观了他途经的一些寺庙，在旅行日记中一一作了描述。在这些寺庙中可以看到关帝塑像、佛像和中国传说中的各种地狱景象的雕塑。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找到科马罗夫的全部旅行日记，所以不知道他是在何处和怎样买到这些年画的。从他的笔记中得悉，他在通化县到过一家杂货铺，那里出售“布匹、碗盏、纸张、神像、爆竹、冥钞，同时还出售大蒜、蘑菇等。”^①神像大概就是木版印制的民间纸马，这是民间版画的一种特殊形式。

1940年，科马罗夫时任苏联科学院院长，他在致瓦·米·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信中写道，他“在满洲搜集中国年画时，不曾想到过它们的科学价值，而只是注意到它们的风俗价值。

^① 弗·列·科马罗夫：《1897年满洲考察记》苏联地理学会档案（列宁格勒），全宗73，案卷目录1，第29号，第43页。

我在1898年展出自己的全部藏品时，汉学家们态度之冷淡更使人以为这些藏品毫无价值。”^①这说明，当时的俄国汉学家们只注意研究正统和儒家的中国，热衷于研究儒·道·佛和搜集民间文学作品（如瓦·帕·瓦西里耶夫院士或阿·奥·伊万诺夫斯基），尚未开始研究极其值得注意的中国民间文化。不过毕竟可以说，正是科马罗夫为俄国汉学研究这个新方面开了头。科马罗夫带回来的画中，有一幅画着一个骑鹿的寿星。当时在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就读的大学生瓦·米·阿列克谢耶夫看到了这幅画。这位好学的一年级大学生很想弄明白它的意思和读懂画上的题词，但没有成功。他请教当时在该校任教的一位中国老师。但他只是笑笑说道：“这些东西都是凡夫俗子所为。我不愿意在大学里见到这些东西。”在对待中国民间版画的态度上，植物学家科马罗夫和大学生阿列克谢耶夫所遇见的情况同七十几年前俄国第一位研究俄国民间版画的伊·米·斯涅吉廖夫正相似，后者在1824年曾向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提交一篇研究民间版画的论文，当时“某些会员甚至怀疑，他们的协会是否可以或者应该讨论此类低级粗俗的里弄坊间之物。”^②

中俄两国知识界对民间艺术的态度在很多方面都相同。在中国，印行数量巨大的年画也被认为是雕虫小技，如中国人所说，“不登大雅之堂”。

年轻的阿列克谢耶夫为看不懂这幅中国年画而不得安宁。大学毕业后，他应聘到冬宫博物馆（艾尔米塔什）去鉴别该馆收藏的中国和日本古钱。在这些古钱中，发现了一些币式的青铜护身符，据说挂在身上可以避邪。上面的图形和文字含有各种咒语和祷告的意思，了解起来极为麻烦，但这却更加激起青年汉学家研究中国民俗和民间信仰的兴趣。1904年，留在大学为取得教授职称做准备的阿列克谢耶夫奉派去英国和法国进修。他在不列颠博物馆古币部研究了古币式护身符，日益倾向于以此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他被古代文物所吸引，而为了研究古代文物，就不仅需要释读复杂的符咒文字，而且还要直接了解沿袭着古代习俗的中国人民。当时阿列克谢耶夫已经寄希望于直接了解中国人民，因为在欧洲进修之后他将再到中国继续进修。他于1906年秋季到达北京。他跟中国先生学习阅读较难懂的中国古文，同时满腔热情、兴致勃勃地广泛搜集民俗学材料。他记录保姆哼唱的摇篮曲、盲艺人的说唱、传说、寺庙掌故，抄录街头巷尾的碑铭、各种匾额和布告、尊崇孔子的颂词、各种祭文、咒语、古代宫殿瓦当上的吉祥纹样，收集刻印的各种信笺，这些信笺上的画大都以与字谐音的方式表达各种复杂的祝愿。

中国民间年画当然也立即成为这位俄国汉学家的搜集对象，几乎成为他的主要兴趣所在。他把护身符作为学位论文选题的想法已被放弃。阿列克谢耶夫一到北京即着手搜购年画，幸好它们的价格很便宜，这对一个手头并不宽裕的青年进修生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阿列克谢耶夫怀着一个收藏家的满腔热诚“猎取”年画，四出寻访出售年画的店铺。在他首先买到的一批年画之中，就有1898年在大学时使他极感兴趣的那幅年画，因为它在中国流传极广。但是，觅得和买到一幅画毕竟要比弄懂它的情节和说清它的象征容易得多，因为当时没有任何

①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全宗820，案卷目录3，库位433，第3页。

② 德·阿·罗文斯基：《俄国民间图画》，圣彼得堡，1900年，第1卷，第286页。